

山東人民出版社
汪伯岩編寫

中國近代史講話(三)

— 洋務運動到中日戰爭

中國近代史講話
(三)
——洋務運動到中日戰爭

山東人民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濟南

內容提要

本書歷史時間是從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到甲午中日戰爭結束為止——一八六一年到一八九五年。包括洋務運動、中法戰爭、甲午中日戰爭三個歷史事件。書中指出：這個時期，是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逐步形成的時期。着重批判洋務運動的反動性，及導致這兩次對外戰爭失敗的主導因素——投降主義失敗主義的滿清外交。最後，書中並總述了這個時期中國政治經濟情勢發展的結果——近代維新運動的開始。

目 錄

一 外國侵略勢力的深入.....	一
二 買辦性、封建性十足的洋務運動.....	六
三 滿清末世割地喪權的賣國外交.....	十四
四 中法戰爭和中國南部友好鄰國的喪失.....	二十
五 在美國支持下日本帝國主義對於朝鮮的侵略.....	二七
六 甲午中日戰爭的經過及滿清戰敗的原因.....	三七
七 標誌着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完全形成的「馬關條約」.....	四四
八 台灣人民的英勇抗日鬥爭.....	五三
九 維新思想的發展和人民大眾的反教會運動.....	五六

一 外國侵略勢力的深入

滿清專制皇朝的同治年間（一八六二年——一八七四年），是中國人民革命運動由高漲轉到低落的時期。在這時期，轟轟烈烈的太平天國革命，以及捻軍和苗、回等少數民族的革命起義，都先後被反動派鎮壓下去了。滿清政權從風雨飄搖中，掙扎到一個暫時的表面的安定局面，它的反動統治又能够「苟延殘喘」。因此，滿清統治者們，就興高采烈地把這個時期稱做「同治中興」。

滿清政府能够從風雨飄搖中取得一個暫時的表面的安定局面，是與外國侵略者對它的幫助分不開的。英、法、美等侵略國家，爲了保護它們在第一次鴉片戰爭和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所獲得的許多利益和特權，並繼續奴役中國人民，對於滿清政府這個已經屈服了的奴才，是採取支持和幫助的政策。因此，它們先後參加了鎮壓太平天國革命，並也干預了進攻捻軍及苗、回起義軍的罪惡戰爭。也正因此，滿清政府才能够撲滅了人民革命的火燄，獲取了它那自吹自擂的「中興」。

唯利是圖的資本主義侵略者，是不肯對它的走狗白扔一根骨頭的。它們既然幫助滿清政府暫時穩定了它的反動統治，便進一步加強了對滿清政權的控制，以便擴大它對中

國的經濟侵略。

首先是外國侵略者對於中國海關管理權的侵佔。

早在一八五四年，外國侵略者就已經從滿清政府手中，取得了上海海關的管理權。當時是由英、法、美三國領事各派一人共同管理海關，而由英國人威妥瑪擔負管理海關的總責。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其他海關，也都為外國人所把持。總攬全國海關權力的總稅務司，和分設在各個海口的稅務司，都是外國人充任。誰都知道，海關可以通過關稅的高低來控制貨物的進口和出口，藉以保護本國的生產，所以海關主權的掌管，是不能讓給外國人的；但是這個關係着全國人民經濟命脈的海關管理權，賣國的滿清政府竟然一古腦兒都送給外國人掌握。它不管國家主權的損失，只要那些洋稅務司，每年送給它若干萬兩的海關稅款，它就心滿意足了。當時滿清政府的財政收入，除田賦和鹽稅以外，主要來源就是依靠海關的稅收，外國人既控制了海關的管理權，就又間接地控制了滿清政府的財政大權。

外國人不僅通過海關行政的管理，掌握了滿清政府的財政命脈，而且還進一步干涉中國的內政。從一八六三年到一九〇九年，一直充任了四十五年的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的英國人赫德，就是一個代表人物。赫德在一八六五年把總稅務司的官署設置在北京，和滿清政府直接打交道，取得了滿清政府的信任。當時，滿清政府對於新興的外交事務，多半不懂，所以在一切國際問題上，都聽取赫德的意見。赫德不僅參與了滿清政府的外

交，同時，在滿清政府的內政上也起着重要的作用。例如一八六七年雲貴總督和四川總督的人選，滿清政府就是根據赫德的建議而任命的。

其次，是關於外國公使駐北京，和外國人干預滿清外交的問題。

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歷來成爲滿清政府與外國侵略者爭論中心的「公使駐京」問題，也在侵略者砲艦政策威脅下勉強解決了，一八六一年，英法俄美等國都在北京設立了使館。以後，外國使節面見皇帝的禮節問題也解決了，各國公使都用五鞠躬禮面見了滿清皇帝。外國公使駐京和見皇帝的禮節，在今日看來，都是不應該成爲問題的，但在當時，滿清政府却把這些看成是有關國體的大事。素來以「天朝上邦」自居的滿清皇帝，絕不許可那些「番邦小國」的使臣駐在北京，更不能容忍不行跪拜禮的外國公使來見皇帝。可是那時滿清皇帝却居然都肯讓步了，這說明滿清統治者已經屈服於外國威力之下，外國侵略者對於滿清政府的支配作用也進一步加強了。

外國公使進入北京後，便想干涉中國的外交，他們首先慫恿滿清政府，派遣使臣出使外國，辦理外交事務。一八六八年滿清政府派遣了出使外國的正式使節。但是，這第一次出現在國際舞台上的中國外交官，却不是中國人，而是由外國人充任的。因爲滿清政府以爲中國人不熟悉外國事務，就聘請原先駐華的美國公使蒲安臣充任中國的全權特使，英國使館翻譯官柏卓安和法國人德善爲協理，組織了一個不倫不類的外交使團，訪問歐美各國。這件怪事算是揭開了滿清派遣使臣出國的序幕。到一八七一年，因爲天津

教案（見本書第九章），派滿洲人崇厚爲特使到法國去道歉，一八七六年，又因馬嘉理案（見本書第三章），派遣郭嵩燾赴英道歉，並被任爲駐英國的公使。

到了這時，滿清統治者不僅在行動上逐漸聽從了外國人的支配，即在對外國的思想認識上也起了很大的變化。原先滿清政府排外的原因，除了盲目自大以外，主要是害怕洋人闖入中國，爲非作歹，威脅到滿清政府的統治，害怕發生像第二次鴉片戰爭時兩廣總督葉銘琛被英國俘擄去那樣的危險；可是後來的事實告訴它不是這樣，第二次鴉片戰爭中，英法聯軍雖然進入北京，但在簽訂了北京條約，滿足了它們的侵略慾望後，侵略軍又撤出北京，並沒有干涉滿清的統治，相反的，倒是幫助它鎮壓了太平天国及其他農民起義。因此，滿清政府就很放心地與這些外國強盜勾結起來，不惜出賣更多的權利給這些強盜們，以換取它們的幫助。這就是滿清統治者從「排外」轉變爲「媚外」、「懼外」的過程。

外國侵略者對於滿清政府政治上控制的目的，是想加強它們的經濟侵略，企圖把中國變成各國的商品市場和原料供給地。隨着它們對滿清政府政治控制力量的加強，這個目的也就逐步實現。到一八九四年中日戰爭的前夜，中國已經開放了三十六個商埠，供給外國商人作買賣，天津、漢口、九江等處也都有了外國人的「租界」。各個通商口岸出現了許多買辦，外國侵略者就通過這些買辦，把它們的經濟勢力，深入到中國的內地和廣大的農村。他們用極低廉的價錢，收購中國的生絲、茶葉、棉花等農產品，又通過

極低的關稅（因為稅率受着協定關稅的限制，同時，海關管理權又掌握在外國人手中），把他們的棉布、棉紗、煤油、毛織物和煙草等工業製成品，大量輸入中國。同時，罪惡的鴉片貿易，仍然公開地進行着，繼續吸吮中國人民的膏血，毒害中國人民的生命。從一八六四年到一八九四年，中國進出口貿易總額由一億海關兩增加到三億海關兩；同時，中國的對外貿易，也從出超，變成了入超，這很明顯的說明外國的經濟侵略加深了。當時，曾經出使英國的郭嵩燾，曾在一篇文章裏描寫這種情形說：「西洋爲害之烈，莫甚於鴉片煙，中國士大夫甘心陷溺，恬不爲悔，數十年國家之恥，耗竭財力，毒害民生，無一人引爲疚心。鐘錶玩具，家皆有之，呢絨洋布之屬，遍及窮鄉僻壤。江浙風俗，至於捨國家錢幣，而專行使洋錢，且昂其價，漠然無知其非者」。這就是說，鴉片、鐘錶、西洋玩具等類物品成了滿清官僚和地主的家常用品，呢絨洋布等也侵入了廣大的農村，江浙等省與外國交易頻繁的地區，甚至連本國的錢幣都不願用，而樂意行使外國的洋錢了，這就是外國經濟侵略勢力深入我國的真實情景。但是，郭嵩燾還只是記述了外國經濟侵略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滿清政府爲了維持它的龐大的開支和糜爛的生活，各種雜稅攤派，更加苛重。中國人民在外國資本主義和國內封建勢力的雙重壓迫下，紛紛失業破產，不僅整個社會進一步殖民地化，人民的生活也跟着進一步陷入苦痛的深淵。

— 買辦性、封建性十足的洋務運動

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滿清政府一方面血腥鎮壓了太平天国革命起義，穩定了它那搖搖欲墜的反動統治，同時，又出賣了大宗權利，換取了暫時的對外「和平」局面。另一方面，在這時期又以湘淮軍閥為中心，搞起了所謂「自強」、「求富」的洋務運動。專門摹仿西洋，購買西洋槍砲船艦，興辦了新式陸海軍，聘洋人，練洋操，同時也辦了一些槍砲廠，連帶着還辦了一些近代工礦業和近代交通事業。這就是反動派們所洋洋得意的「同治中興」。

洋務運動是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的新產物。

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滿清統治階級中，雖然還有一部分守舊不化的頑固分子（以西太后為首，包括滿清貴族、頑固官僚等），對一切外來事物都抱着仇視厭惡的態度；然而實際上，他們又是離不開外國的，外國軍隊曾經幫助他鎮壓了太平天国革命，挽救了他的垂死的命運；外國輸入的奢侈品，成了他們過荒淫生活不可缺少的東西，所以這一派頑固傢伙，表面上仇視和排斥外來事物，骨子裏還是羨慕西洋的「船堅砲利」，希望獲得外國資本主義的扶持和幫忙，來鎮壓國內人民的反抗。

當時，滿清官僚中的另一派人物，是主張向西洋人學習富強之道的，這就是洋務

派。這一派的首要人物是出名的大買辦和大軍閥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他們曾經直接勾結洋兵，鎮壓太平天国革命運動。在鎮壓太平天国革命和第二次鴉片戰爭中，他們親眼看到外國輪船、槍砲的厲害；同時，也親身經歷了人民革命浪潮的衝擊，認識到要想穩定他們的罪惡統治，必須向洋人學習一些本領。因此，他們就發動了以「練洋操」、「用洋兵器」爲中心的洋務運動。

作爲洋務派中心事業的軍需工業，也正是在鎮壓人民革命的血泊中建立起來的。一八六二年（同治元年），正當太平軍與滿清搏鬥最緊張的關頭，曾國藩在安慶設立了軍械所。在這一年，李鴻章也在上海設立了製砲局。他們急急成立這些軍需工廠，目的就是要加緊進攻南京的太平天国。工廠裏的機器設備，不用說都是從外國買來的，就是上海製砲局的技術匠人，也都是聘請的外國人。

在太平軍勢力橫掃長江的時候，江南的地主、買辦、官僚們，正大批地聚集在上海。這些人最恨人民革命力量的發展，因而也最迫切要求學習外國的殺人武器。李鴻章就是這些反動勢力的代表人物。一八六四年，李鴻章和英國流氓戈登的「常勝軍」聯合攻佔了蘇州，他就在蘇州設立了西洋砲局。第二年，攻陷南京，他又在南京設立金陵機器局，在上海成立江南製造局。這兩處新設的廠局，是李鴻章淮系軍閥的軍需工業的重點。

曾、李在南方搞起洋務運動以後，北京滿清政府的頑固派們，也很紅眼，他們感到

要保衛京城，鞏固自己的勢力，專依靠那些土槍土砲是不行的了，因而也興辦起洋務來。一八六七年，滿洲人崇厚在天津設立了機器製造局。後來，李鴻章任直隸總督，在北方擴大他自己的勢力，把這個軍火工廠加以擴充，增強了它的製造力量。從一八七五年起，他開始用人民的血汗錢，向英德等國購買軍艦，建立了海軍，聘用英德等國軍官，訓練他的陸海軍，並派人往德國去學習。北洋軍閥就是這樣起家的。李鴻章也就成了洋務運動的首領。這時，李鴻章不僅已經掌握了一支裝備着新式武器的陸軍，而且新建立了一支相當強大的北洋海軍。李鴻章這個大軍閥頭子，就憑着這些，取得滿清政府的信賴和帝國主義列強的扶持。

另一個熱中學習外國武器的軍閥頭子，是湘系軍閥左宗棠。他在一八六五年（同治四年）消滅了轉入福建和廣東的太平軍殘部後，第二年就在福州設立了馬尾船政局，聘用法國人主持廠務，機器和材料都是從法國買來，正副監督和工程師也都是法國人。這個船廠製造了大小輪船十五隻，編成了所謂南洋水師。後來，左宗棠調往陝西甘肅進攻回民起義軍，又在蘭州設立機器局。這個機器局供應了他不少的屠殺回民的武器。

湘淮軍閥在江蘇、福建開辦了軍火工廠以後，其他各省也相繼建立了軍火工廠。從一八七五年到一八九一年，山東、四川、吉林、廣東和湖北等省都有了機器局和槍彈廠的設置。湖北槍彈廠因有漢陽鐵廠的支持，發展最快，成爲當時規模最大的一個兵工廠。

洋務派辦洋務，開始時，主要是羨慕西洋的「船堅砲利」，所以他們的洋務，也就是摹仿西洋人，製造槍砲船艦，來鎮壓人民的反抗。但建設這些軍需工廠，每年都要耗費很多金錢。李鴻章從籌款困難中，感覺到要想「自強」，必先「求富」，富是強的根本。比如那時軍火工廠所用的煤鐵，都是用大批銀錢從歐洲買來的，這樣日久天長，他們也感到「利源之枯，日甚一日。」因而產生了自己開採礦產的念頭。於是洋務運動的中心，又從建立軍火工廠，轉到開採煤鐵礦產和創辦鐵路、電報以至紡織工業等方面。

一八七七年（光緒三年），李鴻章創辦開平煤礦（河北）；一八九〇年，另一個領導洋務運動的頭子張之洞又開採大冶鐵礦（湖北）和萍鄉煤礦（江西）。江南製造局和天津機器局也都增設了鍊鋼機器，但是出產有限。這時鍊鋼企業較大的，是湖北的漢陽鐵廠。

隨着工礦業的開辦，交通運輸業也有了些建設。早在一八六七年（同治六年），英國商人曾經建築了一條從上海到吳淞的鐵路，但因受到當時封建勢力的反對，那條鐵路後來又被拆除了。差不多又過了十四五年，開平礦務局爲了運煤的需要，建築了一條長二十里的鐵路，後來又延長六十里。到一八八八年（光緒十四年），李鴻章聘請英國人修造津沽鐵路，共長一百七十五里。

洋務派最初使用輪船，主要用於軍事方面。馬尾船政局雖然也製造兵商兩用的輪船，但對商業運輸上不起多大作用。一八七二年（同治十一年），李鴻章在上海創辦招

商局，經營長江及海上運輸事業，前後添購輪船三十隻。但由於外國太古、怡和等輪船公司的排擠，和招商局內部經營管理的不好，始終沒發展起來。

爲了「求富」，洋務派又在各地建立了紡織工廠。紡織工廠中最早的一個，是一八七八年（光緒四年）左宗棠在蘭州設立的機器織呢廠，當時主要供給軍用。一八八九年（光緒十五年）張之洞在廣州設立了廣東繅絲局和織布局（官辦），後來又在武昌設置了織布、紡紗、製麻、繩絲四局（官辦）。在上海方面：一八九〇年李鴻章成立機器織布局。第二年上海道（滿清官名）唐松岩又設立機器紡紗廠（官督商辦）。不久，大買辦盛宣懷也在上海設立了華盛紗廠（官督商辦）。此後，紡織工業陸續增加，逐漸成爲中國產業界中的重要部門。

這時，輕工業中的火柴業也開始創立，一八九四年，在湖北設立了聚昌和盛昌兩個火柴公司（官商合辦）。

所有這些工業，絕大部分都是官辦、官督商辦或官商合辦，民營工業還很少。

隨着洋務運動的開展，滿清的外交機構也改造了。本來，中國是亞洲的大國，周圍的許多友鄰國家，在歷史上大都對於中國發生過朝貢關係（歷代的封建朝廷把這些國家稱爲中國的藩屬國），滿清政府設立了禮部和理藩院，分別管理南方和北方藩屬國的朝貢事務。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根據「北京條約」，各國公使以戰勝者的身分進入北京，滿清政府不能再用禮部和理藩院去接待這些資本主義國家的外交官了。於是在一八六一

年（咸豐十年）特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作為在北京辦理外交的機構（相當於外交部）。總理衙門下面，又分設南北洋通商大臣，就近辦理各口岸的通商事務。北洋大臣駐在天津，管理牛莊、天津、登州三口；南洋大臣駐在南京，管理長江流域和山東以南海各口。北洋大臣照例是由直隸總督兼任，南洋大臣由兩江總督兼任。在滿清末年，這兩個總督的位置，又幾乎都是湘系和淮系軍閥充任。因此，湘淮軍閥就分掌了滿清皇朝的外交大權。

和外國交涉需要翻譯人員，為了培養翻譯人材，滿清政府在北京設立了同文館，學習英法等國的文字語言。李鴻章也在上海設立了外國語言文字學館（廣方言館）。不久，廣東也設置了這類性質的學館。上海學館除去培養「承辦洋務」的買辦人材之外，還翻譯一些自然科學和有關機器製造和開採煤礦一類的書籍。這些，雖然都是洋務運動的副產物，可是，講求聲、光、化、電的自然科學，究竟也越來越多地傳入了中國。

從一八六二年曾國藩在安慶籌設軍械所，開始了洋務運動，直到一八九五年中日戰爭爆發，湘淮軍閥的陸海軍在戰爭中完全潰敗，洋務運動也就跟着完全破產。在這三十多年的期間，洋務派雖然耗費了無數的人民血汗錢，建立了工廠，鋪設了鐵路，開採了礦山，架起了電線，也輸入了一些西洋的自然科學；但是，結果並沒有達到他們所標榜的「富強」的目的，而只是加重了人民的負擔，增強了湘淮兩大軍閥的勢力；同時，這種買辦式的洋務運動，也就更加深了中國的殖民地化。

這是不足奇怪的，洋務運動本質上就是反動的。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興辦洋務的目的，表面上雖然打着「自強」「求富」的旗子，實質上却是爲着他們本集團的利益打算，想用西洋的槍砲，來裝備他們的軍隊；摹仿西洋辦工廠開礦產的辦法來擴充本派系的勢力。因此，隨着軍需工廠的建立，和西洋輪船槍砲的購買，湘淮兩系軍閥的勢力也都加強，舊軍閥變成了新軍閥。同時，他們之間的宗派成見，也越來越深，不僅平時互相傾軋，就是在以後的中法、中日兩次對外戰爭中，也都是彼此觀望，互相推諉，最後，造成了戰爭的失敗，使中國進一步的殖民地化。

洋務派所辦的那些工業，又都看作是他們的私人財產。經辦人員，不是官親，就是幕友，既無經營管理的才能，又多是貪污成性，營私舞弊，吞蝕中飽，把一些新設的廠局，都變成貪污浪費的巢穴。結果只能是營業賠累不堪，經辦人員却大飽私囊，發財致富。封建的買辦的洋務運動，其結果就只能是禍國殃民。

洋務運動的反動本質，還表現在它對於外國資本主義的依賴關係上。當時中國是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不僅沒有足夠的資金，而且還缺乏工業建設的科學技術人材。所有工廠的設立，機器的購買，技術人員的招聘，都不得不依賴資本主義國家，甚至工廠用的煤鐵，在洋務運動的初期，也要遠遠地從歐洲運來。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已成爲外國商品的銷售市場；洋務運動開始以後，中國又成了各資本主義國家銷售廢銅爛鐵和破舊機器的好主顧。因此，洋務運動發展的前途，不是促進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而是

走着殖民地的道路。外國資本主義侵略者所以對洋務派採取扶助、支持的態度，也正是企圖通過對洋務派的培養，來加強滿清政府及湘淮軍閥的統治力量，作為它們的在華代理人，以鎮壓國內人民革命運動，替它們穩定中國這個龐大的市場。

洋務運動不僅不能促進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反而是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障礙。因為洋務派對於民營工業，是採取限制和防止的手段的。李鴻章創辦上海機器局的時候，就曾聲稱：「十年以內，只准華商附股搭辦，不准另行設局」。上海機器織布局成立以後，他又宣佈：「無論官辦商辦，即以現辦紗機四十萬錠子，布機五千張爲額，十年之內，不准續添」。這不是明目張胆地阻止民營工業的發展嗎？當時雖然也有「官督商辦」和「官商合辦」的工業，但是大權都把持在貪污官僚手裏，入股商民無權過問；經營上的腐敗黑暗，與官辦營業無異，也就談不上有什麼發展。至於純粹商辦工業，既遭受反動政府的種種限制，又處處受官僚工業的排擠，更難以立足。但是，反動勢力儘管兇狠，總不能一隻手遮過天來，當時官辦工業既然採用了機器，也就不能完全禁止人民採用機器生產，因此，洋務運動也對中國資本主義的產生造成了某些有利的條件。

總之，洋務運動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產物，它具有濃厚的封建性和買辦性。洋務派本身就都是些反動的封建統治者，他們辦洋務的目的，根本不是爲了國家的富強，而只是爲了鞏固他們的垂死的反動統治；他們學習西洋，也不是爲了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而只是想摹仿西洋的一些皮毛，來壯大他們自己派系的勢力。他們既害怕人民革命